

交大大讲堂

JIAODA DAIJANGTANG

2010

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在于有学术，而学术讲座是大学的学术前哨。
「交大大讲堂」立足学科前沿，探讨学术真谛、关注社会现实、倡导学术
交流，为交大学子了解社会、观察世界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视野、更加
多元的视角，听众虽身在校园，却得以融入时代思潮，在思考家国命运
中明晰自己的人生方向。

北京交通大学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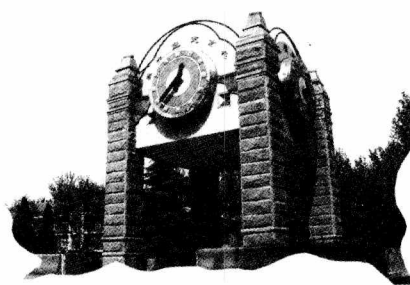
中青院 11 000653611

交大大讲堂

JIAODADAJIANGTANG

2010

北京交通大学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大大讲堂. 2010/北京交通大学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141-0697-8

I. ①交… II. ①北…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1900 号

责任编辑: 王志华

责任校对: 徐领柱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王世伟

交大大讲堂 (2010)

北京交通大学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永胜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16.75 印张 300000 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141-0697-8 定价: 3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2010年是“交大大讲堂”系列高层学术讲座举办的第2年。在主办方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的精心组织下，“交大大讲堂”的影响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成为交大具有号召力的一个学术品牌，在活跃交大学术氛围、加强学生素质教育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0年举办的学术讲座，有直面社会现实的“交大大讲堂”高层讲座，有垂范师生、传承学统的“院士校园行”，也有深入拓展专业学习的“名师面对面”，以及普及卫生知识的“健康大讲堂”等。这些讲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术前沿。在这些富于思想性、前瞻性、学术性的讲座此起彼伏间，“讲座文化”在校园内悄然成形，交大校园渐渐成为一个兼容并蓄的大讲堂。《交大大讲堂2010》收录了2010年“交大大讲堂”经济管理方面讲演的精华，也部分选取了其他讲座中的精华，它们都是“交大大讲堂”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开本书，重温大家名师们2010年在交大的精彩讲演，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激动人心的现场。台上报告精彩不断，台下听众座无虚席，掌声和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为情感的共鸣鼓掌，为智者的思想叫好，一场场精彩的报告在课堂内外掀起了一次次热烈的讨论。主讲人都是国内外公认的学术权威或某一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在与名



交大大讲堂 (2010)

家近距离的接触和沟通过程中，学生们体验其风采，聆听其智慧，学习治学、为人、处世之道。这些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相信，伴随着本书的结集出版，这些大师们睿智精辟的言论必能惠及更多不能亲临“交大大讲堂”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继续关注《交大大讲堂》系列丛书，继续支持交大的发展。衷心祝愿“交大大讲堂”越办越好！

2011 年 3 月
于交大红果园

目 录

▶ 自主创新、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厉以宁	(1)
▶ 经济安全核心是战略产业安全	
柳斌杰	(6)
▶ 产业政策走出迷宫	
林毅夫	(10)
▶ 实现“五个现代化”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新目标	
徐寿波	(13)
▶ 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高尚全	(17)
▶ “后危机时期”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叶连松	(22)
▶ 我国应急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闪淳昌	(64)
▶ 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季晓南	(72)
▶ 自主创新与创新方法	
刘燕华	(89)
▶ 关于软实力研究需要讲清楚的几个问题	
张国祚	(123)
▶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常 玲	(131)
▶ 如何应对美国的货币战	
曹 彤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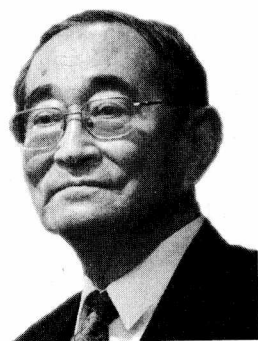
交大大讲堂 (2010)

▶ 学术创新的几个问题	
张耀铭	(153)
▶ 当前国内外能源形势与中国的能源战略	
周喜安	(179)
▶ 探索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关建中	(188)
▶ 2011: 冀望土地和国企改革突破性进展	
周天勇	(202)
▶ 从“山江湖工程”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史忠良	(207)
▶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贸易摩擦新特点及我国产业安全面临的新形势	
杨 益	(218)
▶ 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七宗罪”	
向松祚	(233)
▶ 2009 年中国产业安全状况综述	
李孟刚	(240)
后记	(257)

自主创新、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厉以宁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强烈冲击

以前，不少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感到满意，只有较少的人察觉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并且越来越具有出口依赖性质。2008 年第三季度以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在政府加大投资和扩张信贷的刺激下，2009 年下半年，其经济增长率终于止跌回升。这一过程使较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中国经济难以走上稳定持续增长的道路。这可以说是 2009 年这一年中国从经济波动中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成为出口依赖型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在这以前已经成为高速增长依赖型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有高速度，这是受就业压力越积越大的逼迫所致。换句话说，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人员分流，以及农村多余劳动力一直不断地流向城市，再加上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使得就业形势始终是严峻的，于是经济增长必须保持高速度。2008 年的经济波动表明，当该年 11 月起经济增长率下降到略高于 6% 时，失业人数就骤然上升了，似乎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达到 9% ~ 10%，甚至超过 10% 时，就业问题才稍稍缓解。为了社会稳定，看来增长 ~ 增长是唯一



的选择。从另一角度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包括若干大中城市的经济,已被迫走在增长~增长的道路上,非高速不可。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以下,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等情况。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无非要依赖投资、消费、出口。其中,对投资的依赖是一贯的。20世纪50年代起,投资就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多少长期内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至于消费,这些年来,直到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剩下的就是出口,近些年来正是出口在中国经济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突出。能增加出口,并不是坏事,即使在今后,我们也仍然应该重视出口贸易,需要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但较大程度地依赖出口,却不是好事,因为这容易导致我们受制于人、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动、受制于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定。更何况,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相当多的产品全凭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企业盈利空间则是有限的。此外,还有一些出口产品是高耗能型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是中国的能源,污染则留在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尽管这些产品的出口维持了一部分工人的就业和为国家挣得了外汇,但这是种不可持续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方式。

二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出口依赖型的增长状况。怎么改?一要靠自主创新,二要靠扩大内需。

2008~2009年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主创新是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城市的繁荣或衰退,取决于自主创新的力度。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莫不如此。自主创新做出了成绩,城市和企业不仅掌握了核心技术,而且创立了品牌,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市场也就打开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样的城市和企业所受的影响是较小的,它们有很大的机会在保持国际市场上原有份额的同时,还在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内需的扩大同样有助于早日摆脱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方式。在GDP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首先要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投资和消费二者并重,然后再让消费所起的作用逐渐大于投资,这样GDP的增长就有坚实的基础了。当然,出口这时仍然有必要占据一定的位置,但这已经截然不同于对出口依赖时的情况。扩大内需,主要是指扩大民间消费,而民间消费的扩大,一是以城乡劳



动收入比重占 GDP 的上升为基础的，二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基础，这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规律。需要指出，这里所指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从承包土地入股获得的分红、农民出租自有住房的收入以及农民经营商店和作坊的投资盈利等。那么，居民的消费会不会有一个“饱和点”呢？即国内消费品的需求在“饱和”之后会不会停滞不前呢？这取决于消费品设计的创新、制造工艺的创新和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考虑到目前的生活质量水平和消费方式，即使所谓的“饱和”，那也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靠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摆脱了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方式之后，我们的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就真正成为自主的对外贸易了。这里所说的自主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指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了主动权。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我们不会不惜代价地增加出口，也不会在国内某些产品供应紧张时勒紧肚子“挤出”产品出口。同样的道理，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我们的对外贸易将不再受制于人，不怕其他国家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来限制我们，从而对外贸易得以建立在真正互利互惠的平台上。换句话说，只要有自主创新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只要我们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国内民间需求旺盛，可以出口的出口，需要进口的进口，那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实际上，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摆脱对出口高度依赖的轨道，更重要的，这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通过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资源节约了，环境清洁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可以实现了。而由于内需的扩大以及国内市场潜力的不断挖掘，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投资，还会制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就业压力逐渐缓解，这样，中国经济就不一定非维持高增长率不可，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会维持在适度增长的水平上。

三

如上所述，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就业压力增大的挑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受到这一挑战的影响。这是因为，即使城市当局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他们会有所顾虑：如果要关闭一批污染重、耗能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本地的财政收入不就减少了吗？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率不就上升了吗？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如果他们不愿回乡务农，有什么办法安置他们？如果他们回乡了，是不是有那么多土地可让他们耕种？再说，即使关闭了一批应当被淘汰的企业，那么本地如何兴建后续的、替代性的企业呢？资本从何而来？市场有没有保障？技术水平能不能符合市场的要求？否则，就业压力依然难



以缓解。在这一大堆问题面前，城市当局陷入两难境地，所以顾虑重重。

政府增加投资并且用注入实体经济的决策是正确的。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今后持续的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改善民生，但这并不等于可以迅速缓解就业压力。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了，不可能为下岗或新增的妇女劳动力直接提供就业岗位，也不能让那些已有一定技能的下岗工人安心地去基建工地干活。因此，城市当局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如下的对策，即在有步骤地关闭那些污染重、耗能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的同时，以扩大融资和支持兼并重组的方式，让一批有市场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以增加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和帮助那些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社区、街道服务单位，让他们增用劳动力（如环卫人员、维护治安人员和照顾老人、病人、孕妇、儿童的服务人员等）；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如果愿意自行创业的，可以给予贷款帮助，让他们开店，开作坊；对于有就业愿望而又适合在某些行业工作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以便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此外，建议在市政府之下设置指导性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为广大中小企业服务。

在这里还应当着重指出城市支持、扶植微型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要意义。

以往，我们都习惯地按经营规模和资本金多少把企业分为大、中、小型企业。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划分仍比较简单，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应当把小企业再一分为二，即分为小微企业和微型企业。微型企业通常是指雇工人数和资本金都很少的企业。例如在重庆市，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包括投资者和雇工）不足20人，创业投资金额不到10万元的，就称为微型企业。

支持、扶植微型企业的意义在于：

第一，微型企业的建立，可以吸纳许多人就业。要知道，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部分人就业了，就有了收入，他们支出了这些收入，就给更多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第二，微型企业是适应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它们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而且方便了群众。

第三，对微型企业的扶植能大大调动民间创业的积极性，它们遍布于各行各业，使人们乐于创业、敢于创业、争做创业者。这种创业热情既反映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增强，也反映它们对自己的才干和信心的肯定。一场群众性的创业活动必将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可估量的成效。

第四，微型企业中有一些是科技人员创办的，具有高新科技的特点，它们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成绩，会被风险投资者看中，投资介入，迅速成长，有的后来能成为大企业。



第五，微型企业还可以成为大中企业生产的配套合作者，这一方面有利于微型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大中企业效率的提高也有积极作用。

因此，城市当局应当把支持、扶植本地微型企业作为政策重点，政府的支持扶植主要表现在财政、信贷、培训和注册登记四个方面。

财政方面：一是对微型企业的税收实行减免；二是对微型企业的创业资本金不足者，根据条件，给予一定补助；三是对开业后一定时期内自主创新或其他方面作出较大成绩的给予奖励。

信贷方面：对于微型企业提出贷款要求而又缺少抵押品的，可以由担保公司给予担保；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贷款给予利率优惠。

培训方面：可以在城市内设立各类微型企业投资者培训机构，减免他们应当缴纳的培训费用；对于微型企业的骨干人员，也可采取类似的办法帮助他们接受培训。

注册登记方面：在微型企业投资者申请注册登记和银行开设账户方面给予方便，简化登记开户手续。

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扶植，微型企业一定会在各个城市中有很快的发展。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一个没有大量微型企业的城市，显然是人气不旺的；一个存在着大量微型企业的城市，居民的创业热情高，就业状况好，城市就有了生气，有了活力，经济上去了，社会也就比过去和谐了。

经济安全核心是战略产业安全

柳斌杰



柳斌杰：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一场金融危机引发了政界、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深思，不仅使人们关注国际金融秩序、货币政策、银行监管体系诸多金融方面的问题，而且涉及了各种主义、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深层次问题的讨论。许多政治家、银行家、经济学家也把精力放在应对金融危机上。对于度过当前危机来说，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整个经济生活来讲，只关注虚拟经济法则是不够的。事实上，基于物质财富创造的实体经济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景，战略产业安全比金融安全更重要。

为什么呢？我讲三点理由。

第一，从纵向看，近几百年的经济史表明，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出现的老现象。据统计，从1819年银行机构大面积破产——构成经济危机至今，已经发生过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局部性的此类危机几十次，每次的结果都是以部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或多或少的调整而告终，既未影响基本制度，也未改变经济运行的模式，只触及战术层面的问题。

第二，从横向看，当前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只是影响到少数国家的少数产业，对许多国家和地区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并不太大，即使美国这样引发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实体经济也未有什么重创，人民生产、生活基本如常，更谈不上对制度、模式的动摇。恰恰相反，美国借此大做文章，制造全球“恐危症”，任其美元贬值，转嫁债务，把自己金融管理混乱造成的“泡沫”推给别国去承担，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欠债，全球埋单”。我们大可不必把精力花在美国人的圈套上，我们的物价在涨，我们的房价走高，我们的生产高速发展，我们的经济生



活没有什么危机的表现，就是出口减少也只是结构性问题，自主创新的产品出口大幅提升，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第三，从深层看，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那么人类需要什么呢？当然是能够解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实体经济才能生产出解决人们吃、穿、住、行问题的物质产品和解决人们德、智、体、美问题的文化产品。而那些货币、证券、信贷等虚拟经济不过是主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条件。如果我们经济学家、经济领导者只关注那些并无决定意义的问题，而不下工夫发展战略经济，特别是不关注战略产业的基础地位，那就是本末倒置，到后来，真可能造成整个国家经济崩溃、人民遭难的大危机。因此，从战略思维的角度讲，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条件下，一个国家始终要把战略经济放在首位，抓住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不放松。对我国来说，这些做到了，国计民生才有保障，什么样的金融危机都阻挡不了民族复兴的前进步伐，也动摇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也是最大的经济安全。

那么，什么是战略产业？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生存产业。就是关系生命健康、存续的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例如粮食、食品、药品、住房、服装产业及其相关工业。人类存在的价值是以生命的健康为前提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要。即使在当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条件下，吃、穿、住仍是任何人的基本生存之基。联合国秘书长最近公告全球，尚有十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每天都有人类的兄弟姐妹因饥寒交迫而死亡，许多国家因缺少食物而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粮食安全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严重问题。近几年发生的流行疾病，使不少的生命过早结束了，对治病救人的药品和医疗技术工具的需求尤显迫切。面对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物质生产问题，那些只关心 GDP、只注重虚拟经济的理论，就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基础产业。这是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提供基础条件的产业，主要是指能源、交通、电讯等产业门类。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能源已经成为目前各个国家争夺的战略重点，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社会政治稳定。由于矿石能源分布不平衡并在不断减少，再生能源、新能源开发滞后，能源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些国家和地区。而工业化和现代化对能源的要求在大幅提升，这个矛盾将在很长时间内影响全球经济安全，甚至会造成致命的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交通、电讯等基础产业地位上升，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和人们信息交流的效率，如果出现交通瘫痪、电讯中断这类问题，也是打乱社会安全、生活秩序的关键问题，直接影响经济安全。

第三，装备产业。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最根本的是体现在装备制造产业的发



展水平上,这种产业是自主知识产权、材料工业、制造能力和工艺技术等完美统一的硬实力。有些国家是靠进口解决装备,而不具备装备制造的能力,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部门的基础装备和国防装备实际是不安全的。在经历战争或灾难后,有些国家能很快恢复发展、强大起来,有些国家则陷入困难、无法复兴,就是取决于装备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国家经济、国防安全来说,装备制造产业是个决定因素。

第四,环保产业。人类和自然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人类要想有一个适宜生存和和谐友好的环境,保证自己生活的舒适、安全,就要珍惜和保护自己的家园——地球。人类经历的自然灾害证明,不仅许多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洪水等会给生存带来安全威胁,就是人类不当的生产、生活行为也会给自身生存带来不良的环境,例如目前全球关注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温室效应、气候问题等,如果任其下去,也会有毁灭人类的危险。这就警醒世人,要发展环境保护的产业,开发清洁能源、环保材料、节能减排、防灾减灾、森林碳汇、控制排放等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技术和产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安全生存和持续发展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在当今过度探索大自然的情况下,它是最大的经济安全问题。

第五,信息产业。由于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今天的经济、产业活动已经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支持,信息产业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中有主导作用。而它对未来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认识到位,未知的会大大超过已知的。再加上我国许多产业部门,并没有信息化的自觉,而是被动拖入信息化潮流中。所以,认识信息产业、发展信息产业、使用信息产业的成果,维护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专家学者,必须要把信息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加以高度重视、务实推动,使之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之一。对待这些新兴战略产业,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去对待,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它都会进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改变你的生存方式。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信息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对经济安全的决定作用,因势利导地发展它、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学说。这个学说集中研究人类解放的途径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指出未来社会人类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就是回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经济安全的研究,就必须以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全面考量经济安全的核心和要素。而我们一些经济安全的研究者,只把经济安全放在虚拟经济要素如货币、信贷、证券、股市上,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决定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



的安全问题研究，我以为是有偏性的。它的后果是会误导社会经济生活的注意力，只注重那些虚拟的数字、指标，而对支撑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漠不关心。试想一下，把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工业危机、环境危机、信息危机和次贷危机放在一起比，哪一个更致命？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使经济决策者真正关注经济安全问题，能作出保持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安全运行的决策，我们必须把战略产业安全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上，把深入调查各类产业发展遇到的问题，提供实体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备的情况下，货币、价格、股市、信贷等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产业经济的实际效果，例如生产效益很好的企业股市都很低迷，实际效益很差的企业股市反倒上扬，市场失灵、价格失真、股市失调，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切不可由此而忽略了真正的经济安全。

当然，经济安全问题是复杂的课题，除了虚实关系之外，还有内外关系，就是不可局限于一国之内，全球经济安全上的问题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开放国家的经济安全，全球产业安全也直接冲击别国的产业安全，例如石油安全、粮食安全等都会引发全球的灾难或危机，这也是在战略产业安全问题上不容小视的国际因素。

产业经济是金融类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前者是第一性、决定性的，因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第一位的需求是延续生命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一切其他活动只有在解决吃、穿、住、行、用的前提下才能存在。但是作为流通、中介的金融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对实体产业的发展有强大的反作用，尤其是在宏观调控、国际贸易、市场交易等方面也是重要的杠杆。所以，对金融安全也不能轻视，应当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快改革我们的金融体制，加大调整金融结构、信贷结构和外汇结构的力度，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更好地为我们的战略产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产业政策走出迷宫

林毅夫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在2010年，一个秘而不宣的经济秘密再次得到了大力证实：大多数国家都在有意无意地推动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其中不但有中国、新加坡、法国和巴西这些老面孔，还包括那些原本产业政策不甚清晰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智利和美国。

这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产业政策其实就是为刺激某一项产业的经济活动或投资而出台的所有政府决策、规定或者法律，上述国家也都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毕竟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本来就是产业和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产物，而这个更新过程则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协同一致才能实现。

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成功从农业经济转型为现代经济的国家——包括西欧、北美以及近几十年来的一批东亚国家——政府都能与私人企业的相关投资统一步调以促进新产业的发展，还经常为那些产业先行者提供一系列激励措施。

即便是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导致的衰退之前，全球各国政府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补贴、减税或者开发银行贷款）来支持私人部门，以达到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的目的。在许多高规格峰会上的政策讨论都趋向于加强产业政策的其他方面，包括对机场、高速公路、码头、输电网、电信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提高行政效率，强调人才教育和技能，以及构建一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法律体制。

最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产